

## 试析冷战后中国对日政策

梁云祥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最剧烈的一次变化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一次巨大动荡，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都纷纷制裁中国或想要改变中国。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国展开了积极的外交，实施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很快打破了暂时的孤立状态，并更加开放和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其中，对日本的政策也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与日本对华政策的不同变化而逐渐调整成形，即一方面基于同日本的友好而谋求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对日本加以防范。

**关键词：**中国外交 对日政策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梁云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100871）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苏联集团的瓦解与苏联自身的解体，这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战后长期以来的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结束；第二个变化是作为冷战结束导致的又一个结果，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经济的发展与全球性问题的突出。因此，这一新形势最显著的两个特点，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和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趋势的加强。随着这一变化，整个国际关系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都在根据国际形势与其他国家所做出的反应来调整与重新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同样，作为东亚地区大国的中国，也在适应这种变化，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其中，对日本的政策在中国的整个对外政策中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也同处东亚，在地缘上与中国有着难以脱离的关系，另一方面日本的实力与其未来的发展也迫使中国必须重视日本。为此，本文就尝试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对日政策做些叙述与分析。

对中国而言，新的国际形势，既包含了一种机遇，同时又面临挑战。从机遇方面来说，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总体和平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国内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中国有可能继续保持同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关

系；同时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又使中国可以更快地彻底融入国际社会，并且在其中显示自己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从挑战方面来说，中国在政治上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苏联解体后中国的整体战略地位下降，反而成了在政治上应该设法加以改变的国家，因此在对华交往中不仅仅只考虑经济因素，而且还要求中国做出实行所谓自由、民主与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尤其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在诸多政治问题上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同时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风险，中国以一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地位，要应对以发达国家为主要角色的全球化潮流，就需要在既发展自己、使自己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但又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不至于使自己成为发达国家的牺牲品这二者之间进行平衡。因此，新形势下中国对外政策的着眼点就在于既要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共同承担起世界性的责任，同时又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尽量减轻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与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同样，作为西方国家一员，同时又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在冷战后虽然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对权力的诉求却更为强烈，而且客观地说，新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日本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同美国与欧洲国家比起来，过去日本在其外交政策中政治因素的考虑相对较少，但在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外交政策中的政治化倾向有所加强，其对华政策中也更多地开始带有政治色彩，同时也积极谋求参与一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试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国际性作用。因此，日本的对华政策改变了过去那种“经济合作，政治反省”的基本模式，突破了过去单纯考虑双边关系的框架，既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采取限制中国、进而改变中国的政策，又考虑到作为东亚大国与中国邻国的现实而采取稳定中国 and 同中国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的政策。

## 二

冷战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或者说是对新的国际形势与日本对华政策的一种反应。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成为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一个分水岭，它们迅速改变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转而一致谴责和制裁中国，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日本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当然也加入了这一谴责与制裁的行列，但又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表现得比较慎重与克制，希望中国尽快恢复稳定，因此甚至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批评，被指责为没有原则。在1989年7月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又采取了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做法，坚持将避免使中国孤立的内容写入了会议宣言。对于日本的这些举动，中国立刻给予了回应。7月3日，李鹏总理在接见日本一个访华团时表示：“我们注意到众多的日本朋友与著名人士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对中国平暴事件采取了比较公正的态度，并表明愿为中日友好继续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与感谢。”<sup>①</sup>8月10日，日本组成海部新内阁，李鹏立即打电报表示祝贺。9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代表团时对不久前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提出批评，但又表示：“中国方面注意到日本在会议上态度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中日友好十分重要，对中国十分重要，对日本也十分重要。友好对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和平与发

<sup>①</sup> [日] 田中明彦著：《日中关系1945—199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4月，第178页。

展有利。不管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国国内有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是大家的愿望。”<sup>①</sup>通过这一系列表示，可以看出中国领导层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尤其在面对西方国家制裁的情况下更看重日本。

随着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率先逐步解除对华制裁，中日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91年8月10日至14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这是天安门事件后第一位西方国家的首脑访问中国，标志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开始解冻，同时也说明中日关系对双方而言都较为重要。在这次访问期间，海部发表了题为“新的世界与日中关系”的演说，其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的一个新概念，即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也就是说中日关系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双边关系的问题，而应该将其放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来定位，即希望与中国在一些地区或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中国领导人也表示了基本相同的看法，并且第一次与日本共同讨论了诸如人权、民主、地区形势、裁军和军备控制等政治性和多边性的问题。这一状况说明，中国承认了日本在冷战以后国际地位提高这一现实，在政治上也希望与日本合作，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不但共同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对一些地区或全球性问题也共同承担责任。如在随后不久日本外相访华时，中国外长钱其琛就表示：“长期、稳定地发展中日睦邻合作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不会改变。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双方应该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21世纪中日友好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两国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磋商，共同为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这是我们的责任。”<sup>②</sup>其后，中国领导人或中国官方媒体又多次表明了类似的态度，如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4月7日访问日本时所作的演讲中表示：“只要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相互尊重，相互信赖，以诚相待，密切合作，中日友好关系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中日两国加强友好合作，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sup>③</sup>《人民日报》1992年9月29日在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而发表的社论中指出：“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及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日友好已成为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两国更需要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在双边关系上拓宽合作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两国政府和人民新的共同使命。”<sup>④</sup>1994年11月14日，江泽民在印尼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脑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时说：“中日两国作为本地区重要国家，在和平与发展方面肩负重大责任，双方应当高瞻远瞩，站在地区和全球的高度，面向21世纪，推动两国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为人类的进步与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sup>⑤</sup>1997年11月，李鹏访问日本时又主动提出中日应加强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共同携手推进多极化趋势。

在中日两国政治家的共同推动下，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日趋成熟，合作的领域也不断扩大，两国不仅在双边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继续扩大合作与交流，而且在一些多边领域也加强了合作，如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以及地区冲突、环境保护与安全等方面都加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734页。

② 同上，第805页。

③ 同上，第819页。

④ 《人民日报》，1992年9月29日第1版，“继往开来，开创睦邻友好的新世纪——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

⑤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905页。

强了对话或合作。1998年11月，江泽民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在访问之前会见日本《朝日新闻》社社长松下宗之时，江泽民强调访问的目的在于同日本共同构筑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与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框架，<sup>①</sup>访问期间江泽民又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共同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为21世纪的中日关系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具体决定两国领导人每年交替互访，建立政府间热线电话，加强各层次、各级别的交流等等。至此，中日两国共同希望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终于开始建立。2000年，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日本，强调双方的合作关系，并同日本国民进行了直接对话，进一步增进了双方国民的友好感情，强化了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基础。

然而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与政治作用的增强，其对华限制的一面也有所加强，不仅在过去两国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上日本的态度都较之过去更加强硬，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更甚，1996年7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再次正式参拜，2001年又先后发生历史教科书问题与8月13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1996年夏季日本右翼团体又一次在中日双方存在领土所有权争议的钓鱼岛设置灯塔，挑起反华事端，日本政府不但不加制止，反而派遣海上自卫队阻止台湾、香港的中国居民登岛抗议；1994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赴日参加广岛亚运会，在此前后日本赴台访问的政府成员和国会议员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冷战以后日本仍然积极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并将其作为维护整个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保障。这种状况对于中国而言，不能不感到是一种威胁，因为这一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中国，或者说这一体制所维护的安全与稳定同中国认为的安全与稳定不同。因此，中国的对日政策又有对日本充满戒心与加强防范的一面。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刚刚结束时，作为冷战产物之一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也曾受到质疑，然而不久日美两国政府都认为，冷战虽然结束，但亚太地区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和不透明的因素，如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的存在、领土争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等等，因此必须强化日美安保体制。1996年4月16日至1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如何强化日美安保体制。4月17日，双方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从法律上完成了对日美同盟体制的重新确认。随后，又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磋商，制定通过了由两国国防和外交官员组成的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根据联合宣言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双方安全合作的范围与领域，规定一旦所谓“周边地区”有事，日美将联合进行干预。为确保这一防卫合作指针的顺利落实，日本随即着手制定与之相关的国内法律，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改案》，据此日本就可以在发生所谓“周边事态”时出动自卫队支援美军作战。此外，日本在1998年9月同美国签署了早在1993年就由美国提出的双方共同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技术问题谅解备忘录，日美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又加深了一步。

---

<sup>①</sup> 1998年11月13日《参考消息》第1版。

对于日美加强其同盟关系体制以及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进攻态势，中国明显地表示了忧虑和反对。在1999年4月27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三个相关法案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中国对此深表关注，认为在亚太地区局势趋向缓和的形势下日本执意制定旨在强化日美军事合作的相关法案，不符合时代潮流，也将给本地区的安全形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和消极影响，并要求日本以实际行动恪守承诺，不做任何干涉中国内政和有损中日关系的事。与此同时，新华社也发表了述评，指出日本国会通过的相关法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战争合作法案”。尤其是对TMD问题，中国更是多次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样将会破坏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引发新的军备竞赛与不稳定。

### 三

2001年震动世界的“9.11”事件后，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迅速表明态度，在坚决支持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建立国际反恐联盟的同时，日本政府很快提出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三项法案，并迅速在国会获得通过。据此日本可以更自由和大范围地使用军事力量，并且在11月9日已实际向印度洋派出了军舰，对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事进行后勤支援。12月22日，日本再次根据新制定的《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对一艘进入其认定的专属经济区内的“可疑船只”开炮并将其击沉。对于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了严重的关切和忧虑，希望日本要谨慎从事，尤其在使用军事力量方面不要走得太远。

由此看来，冷战后中国的对日政策，一方面基于同日本加强各方面的合作而开始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政治、安全等方面对日本加以防范，因为在这些方面中日之间还不能说已形成了普遍的共识与合作的基础，反而常常会有一些矛盾与冲突。因此，未来的中日关系将非常微妙，双方既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性，但也存在着潜在的矛盾与冲突，关键在于如何尽可能去寻找共同利益，加强合作，增加信任，避免危机，消除矛盾。从政府的政策层面上来看，就应该去适应这一需要。

冷战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与自己的利益所在，即在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安全利益以及国家尊严，有时不得不同它们处于暂时对立的境地，但为了发展自己，必须要与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其中主要包括同日本的关系。因为两国地理接近，历史、文化渊源深远，经贸关系密切，根据目前国际形势与日本现有国力及其日本未来的发展，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与安全的角度来说，中国都需要与日本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现在，中日两国已经明确了未来关系发展的目标，即致力于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目标而已。为了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双方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点和设法消除依然存在的矛盾。从中国方面来说，目前应该更多地将对日政策的视野超越纯粹双边关系的范围，而将其重点放在谋求与日本在一些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比如共同携手振兴东亚经济、共同解决东亚现有危机、共同应付东亚环境污染等跨越国界的问题、共同探讨东亚未来的安全合作模式等。对于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不能漠然不顾，但很多问题只能在两国对东亚具有共同责任的前提下才能解决。在对地区以至某些全球性问

题进行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才能够逐渐建立起信任，而只要有了相互信任，目前存在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得到缓解以至解决。比如，在历史问题上，中日两国常常相互指责，一个说对方总是试图美化自己的侵略历史，另一个又说对方总是抓住过去的历史不放以至夸大其词。在对日美联盟的问题上，中国感到强化这一联盟对自己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因为它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而日本却认为只有强化这一联盟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中国的发展引起了日本的担忧。双方的这些指责和担忧，其实就是由于缺乏相互信任所致。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在避免发生危机的前提下暂时淡化这些矛盾，不仅仅在政府级别的交往中淡化这些问题，而且在对国民的宣传与教育方面也应该这样做，特别是要避免在媒体上渲染对对方的怀疑与仇恨，以至于引起国民感情上的裂痕。只有尽可能去寻找两国在一些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共同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相互信任与协作的关系，两国双边关系中的矛盾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责任编辑：王 联）